

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关头 / 陈东林

陈云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 / 陈群 孙东升

胡耀邦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甄实

胡乔木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王建军

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  
——龚育之访谈录 / 谢春涛

在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 程中原

# 24 读·党史

## 第24辑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诞生

陈澍 / 编

# 24 读·党史

第24辑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诞生

陈澍 / 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诞生/陈澍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1

(读·党史)

ISBN 978-7-5098-2901-1

I. ①关… II. ①陈… III. ①中共中央—党史—问题—  
决议—注释 IV. ①D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7577 号

启事:本书选用的部分文字、图片,来源于各正式出版物。其中还  
有部分作品尚未与有关作者、编者取得联系,我们深感不安。恳请  
有关权利人联系我社,我们将按《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支付稿酬。  
(联系人:贺冬英 电话:010—82517196)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领衔编辑:潘 鹏

责任编辑:吕佳音

复 审:潘 鹏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增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45mm×210mm 1/32

字 数:116千字

印 张:5

印 数:1—3000册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2901-1

定 价:12.00元

---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 目录

## CONTENTS

### ▶ 人 物

- 1 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关头  
/陈东林
- 15 陈云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  
/陈 群 孙东升
- 30 胡耀邦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甄 实
- 45 胡乔木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王建军

### ▶ 回 忆

- 54 中央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导思想  
/邓力群
- 68 亲历“历史决议”起草的前前后后  
/龚育之

### ▶ 访 谈

- 79 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  
——龚育之访谈录 /谢春涛

# 目录

CONTENTS

## ▶ 史 事

- 10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  
四千人大讨论 /程中原 夏杏珍

## ▶ 专 论

- 112 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  
区别 /胡乔木
- 116 “文化大革命”是个内乱 /胡乔木

## ▶ 视 野

- 119 在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怎样坚持毛泽东  
思想 /程中原

## ▶ 链 接

- 138 毛泽东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  
形成 /李东朗
- 156 编辑手记 /吕佳音

## 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关头 / 陈东林

### 在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用“四两拨千斤”的一句话，提出了以后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

1976年10月，中南海里用一场兵不血刃的斗争粉碎了“四人帮”，中国沸腾了，人民欢庆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但此后，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待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世界和中国都在关注着，等待着，猜测着。

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照过去方针办”的既定思维出发，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一方针，“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冤假错案不能平反，中国仍然被束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迈不开步。党内和社会上许多人对此十分不满，但都苦于没有足够的权威和思想来抵制。这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于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绵里藏针地提出了一句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的名言：“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图为邓小平在会上讲话

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句话蕴含着两方面的阐释，成为后来我们改革开放的两个支撑点：一是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基本原则；二是不能坚持错误的、片面的毛泽东的个人指示。实际上，这已经提出了以后起草《历史决议》所遵循的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

1978年5月11日，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

表。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共产党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无限丰富的实际生活，应当勇于探索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说，这并不是理论新发现，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毛

泽东曾经倡导的实事求是。但是，由于“文革”的破坏，人们还不得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花很大力气进行拨乱反正。一石激起千层浪。

《光明日报》的文章引起了远远超越思想界的大讨论，也招致了当时中央一些人的指责。邓小平、罗瑞卿等挺身而出，对讨论给予了及时的支持。到年底，大讨论已经形成了主流和共识，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其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了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此

间，陈云提出的解决“六十一人集团”、“天安门事件”及为陶铸、彭德怀下结论等6个历史遗留问题，引起与会者强烈反响，会议气氛空前活跃。经过讨论，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将对上述事件和个人予以平反或调查。此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两年来呼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当时有人提出，索性由中央作出一个决议，把过去的错误统统否定，冤假错案统统平反。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但是，历史并不是烙饼，不能一翻了之。这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才刚刚全面启动，对“文化大革命”尚未公开否定，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更没有提上日程。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尚需时日，当时更重要的事是如何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尽快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语重心长地说道：“‘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

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的，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还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事实证明邓小平冷静判断的价值。当时，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认识远未得到统一。1979年春举行的理论务虚会，对过去的一系列理论、政策进行了探索和讨论，为中央解决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另一种倾向也开始冒头，即出现了一些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社会上还发生了“西单墙”等事件。因此，国外纷纷猜测，中国在“非毛化”了。

又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指出：现在，一方面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攻击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我们要在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

经过邓小平有关纠正“两种错误思潮”的阐述，全党全国初步完成了正确认识历史的理论准备，具备了总结历史的初步条件。党内外也开始出现了这种呼声。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人提议：希望党中央尽快作出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党澄清是非、统一思想，造福子孙万代。

1979年6月，中央作出决定，着手起草叶剑英代表中央所作的建国三十周年国庆讲话。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为此，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在起草讲话过程中，邓小平四次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特别

强调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

9月4日，邓小平看过修改稿后，找胡耀邦等谈话，指出：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要使人们看了讲话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就是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泽东。

9月12日，他看过再次修改后的讲话稿说：“现在这个稿子，对毛主席讲够了，这样很好。”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获得了全党全国的一致好评，证实了邓小平的远见。同时，这个讲话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尝试和准备。在讲话中，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直接点名批评，而是采取了省略主语的办法；虽然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还没有在性质和理

论上明确否定。因此，全党全国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此时，中央水到渠成地作出了决策。

1979年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开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谈话内容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准备工作；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宣布，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进行，由他亲自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他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将其具体化、深化。至此，《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帷幕。起草小组开始在毛家湾工作，后来搬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一度还去过玉泉山。小组成员有袁木、龚育之、郑必坚、卢之超、郑惠、邵华泽、石仲泉、席宣、

卫建林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党的理论专家。

当时，也有人主张不急于作这个决议，留待党的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邓小平说：“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 主持起草《历史决议》，“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历史决议》起草历时20个月，较大的修改共9稿。邓小平在主持起草过程中，从确定总原则、设计结构到判断是非、修改文字都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共作了13次专门的重要谈话和讲话，其中有9篇已摘录收入《邓小平文选》。

在起草前，小组花了3个多月时间拟出了一份决议提纲，计划

写7000字,分五个部分:1.1949—1956,2.1957—1965,3.“文化大革命”时期,4.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5.经验教训。邓小平看后,认为面太宽,没有中心。1980年3月19日,他第一次找胡耀邦等人谈话,提出要抓住三条总的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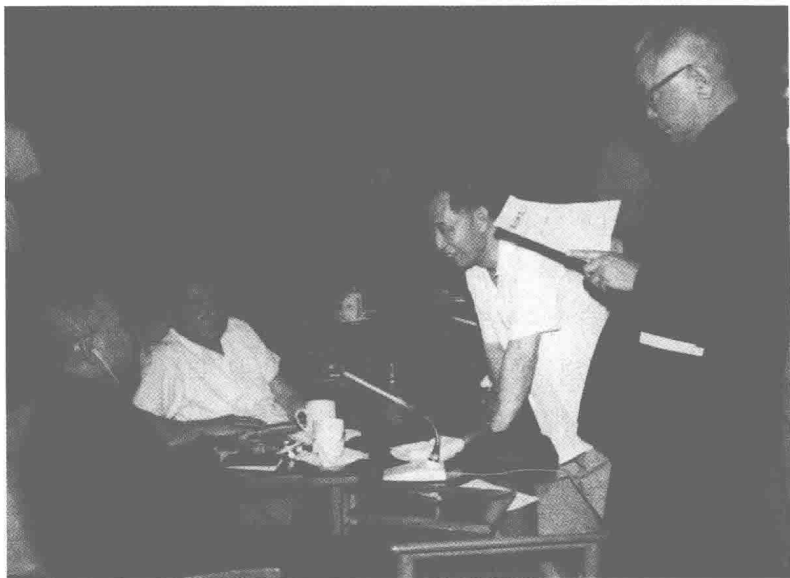
当时,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刚刚传达下去,一部分人思想相当混乱。有的从“左”的角度反对平反,认为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有的从右的角度认为平反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邓小平指出,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同时,他也指出,要对“文化大革命”

时期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

以后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证明,邓小平确实抓住了“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围绕着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起草工作经过了几次反复。

1980年6月9日,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稿。27日,邓小平看后找胡耀邦等人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我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他强调说,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晚年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

8月10日,邓小平又在谈话中说:有些人担心将来有人要翻案,无非是翻毛主席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事实,我看翻也不容易翻。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第二稿采取了主要讲正



邓小平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为起草工作进行了二十多次谈话。图为（左起）陈云、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交谈

确方面的写法，大大加强了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分量，起点得到了提高。9月，印发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再次修改后，于10月份作为第三稿提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党内大讨论。参加者包括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军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和中央党校学员，实际超过了5000人。这次讨论持续了1个多月，重要意见随时写出简报送中央

政治局。在讨论中，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出现了激烈的议论和争论，焦点集中在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多数人同意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毛泽东“功大、过大、罪大”，“过大于功”；有严重的个人品质问题，和封建帝王一样；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误，不应当再提。这些人虽然是少数，但言词激烈，慷慨激昂。受其影响，年底形成的第四稿加重了写错误

的分量，调子比较低沉，对建国以来的成就也写得不足。

还在讨论中的10月25日，邓小平就发现了这一倾向。他看了简报后，立即找来胡乔木等人谈话，首先肯定了讨论中多数人的好的意见，然后又反驳一些人的观点说：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说：“如果不写或者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还不如不做。”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错误，他还说：“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不能写过头。如果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根据他的意见，第五稿扩充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提高了对建国以来17年成就的评价，取消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的说法。

邓小平看了第五稿后，感到问

题仍然没有解决。1981年3月9日，他在谈话中再次重申：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总的说来，我们犯错误还是由于没有经验，大家都有责任。他强调，中心问题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3月18日，他再次指出：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肯不写。这是中心，是关键。这时，陈云提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60年的历史联系起来写的意见，使邓小平长久思考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他高兴地说：这个意见很好。60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依据。

1981年3月，起草小组按照陈云建议修改写出的第六稿，增加了“建国以前28年的回顾”这部分，分送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彭真、徐向前、邓颖超等几十位老同志审阅。大家普遍肯定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评价的部分，认为比较恰当。但是，仍有个

别人坚持自己在4000人讨论时的意见，譬如说毛泽东从建国以来就离开了马列主义。邓小平听了汇报后说：有的同志不高兴，想不通，对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坚定不移地按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邓小平的决心，使《历史决议》的起草顺利解决了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关键问题。

4月，从第七稿开始，《历史决议》进入了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历史决议》第七稿。5月19日和6月22日，邓小平总结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我们原来设想，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起到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我想，现在的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从6月4日到11日，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历史决议》又改出第八、第九稿，形成了提交中央全会的《历史决议（草案）》。6月13日，



198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文

草案稿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会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大而深远的影响。”

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确立

的，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证实了这一指导思想的正确。到1956年中共八大前，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反思和纠正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中国共产党自身还没有取得系统的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八大上没有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邓小平对此完全拥护，并据此主持修改党章，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然而，1960年，林彪却突然提出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口号。此后，“左”的错误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数不少的人，其中包括许多长期跟随毛泽东，甚至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老同志，对要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产生各种看法也不足为怪。而这时，邓小平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绝非是仅仅为稳定大局而采取的权宜之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际国内

环境与1956年相比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全国对于“个人崇拜”的危害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能够科学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的领导人；另一方面，经过建国后30年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以全党的智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了深刻的教训，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提出一个科学论断的条件成熟了。

邓小平作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出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结论，是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作为依据的。正像他多次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从七大提出，到八大不提，再到《历史决议》重提，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思想的又一次升华，也可以说是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思想的重要源泉。在这个意义上评价邓小平主持《历史决议》的伟大贡献，会更加深刻，更加久远。

### **千万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不能感情用事而过多地追求个人的品质和责任，要综合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制度、认识、经验等多种因素**

在讨论《历史决议》时，一些人以完全“客观”地评价历史的立场出发，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党、国家，尤其是对毛泽东的错误，“写深写够”，“不要有任何框框”。对此，邓小平一开始就强调说：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此后，他又指出，千万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

史。如果这样，产生的效果就会是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痛恨我们的决议、痛恨我们写决议的人。

实际上，在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上，从来就不存在超出当时人们认识的纯粹客观反映。相反，那种纯“客观”认识恰恰反映了一些人对建国以来历史主流的主观错误认识。今天，我们回顾起来，如果不是当时邓小平的一再坚持，可以想见，片面夸大历史错误，不仅会产生一个不符合事实的决议，而且将会导致产生否定党和国家历史的思想混乱，断送中国改革开放大好前程的严重后果。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对历史的自我否定成为党和国家剧变的导火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必须指出，邓小平的这个政治大局观，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邓小平不是历史学家，但在中国革命建设几十年历史中的丰富实践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高度掌握，使他对当代历史能有比同时代人深刻得多的洞察力。他指出：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



括建国后的30年中犯过一些大的错误，甚至犯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根据他反复讲的这个意见，起草小组纠正了原来过多反映错误的倾向，牢牢地把握住了建国以来历史的主流，使《历史决议》起到了鼓舞人民前进的作用。

当时，起草小组对建国后各个历史阶段应当如何评价，分歧较大，而这也关系到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总体评价的问题。邓小平的多次谈话分析，为《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提供了指南。对建国以后的30年，邓小平从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角度充分予以肯定。他说：30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同时，他也指出，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致使60至70年代

我们拉大了与世界的差距。他认为：建国后前7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三大改造”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总的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是这10年中也有健康的方面，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承认的。对于粉碎“四人帮”后前两年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应当写进决议，如果不写，就没有理由改变当时执行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结构，指出错误对党和人民有好处，对犯错误的同志也有好处。

对《历史决议》中涉及到的大量历史事件和人物，邓小平从亲历者和主持者的角度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如对建党以来“十次路线斗争”，他赞同胡乔木的分析，认为明显不能成立，不能再使用那种滥用的方式；对“高饶事件”，他列举事实后认为，处理得是正确的；对反右派斗争，他指出还是